

辛亥风雷震江西

聂国柱 易芳霖

一、前奏——萍浏醴起义

1906年12月爆发于江西省的萍乡县、湖南省的浏阳县和醴陵县的萍浏醴起义，是孙中山创立中国同盟会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虽遭清军镇压失败，但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激奋，因而有以后接二连三的历次起义，构成了以率先揭橥“中华国民军”旗号^①的萍浏醴起义开其端，以武昌起义竟其功的辛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全过程。又由于萍浏醴起义的活动多在江西萍乡，因而将这次起义，列入辛亥革命在江西之范围来叙述。

酝酿和爆发

萍浏醴起义，从1906年12月4日（清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十月十九日）在萍、浏、醴三县交界处的麻石爆发，至1907年1月中旬，起义军余部在江西义宁（今修水）县境内被清军击溃而告最后失败，历时一个多月。

先是1905年8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10月，俄国爆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号召无产阶级起义，推翻沙皇，建立民主共和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号召中国人民“闻风而兴起，效法

俄国人民起来革命”^②。孙中山陆续派遣会员回国，从联络会党入手，发动和领导武装起义。

约在1906年春，同盟会会员、留日学生刘道一、蔡绍南等受东京总部派遣，回到湖南，“运动湘军，重整会党”^③。临行前，黄兴曾嘱咐：不能单纯依靠会党发难，因为“会党缺乏响械，且少军队训练，难于持久”，而应该“以军队与会党同时并举为上策”，或者由“会党发难，军队急为响应”为次策。“而欲规取省城，宜集合会党于省城附近之萍、浏、醴各县与运动成熟之军队联合方可举事。”^④此时，恰值湘赣一带，发生了如下两件事情，对革命时机的成熟有着直接促进作用：一是哥老会首领马福益，因密谋在长沙起义，事泄未成，辗转逃亡至萍乡车站被捕，惨遭杀害，激起了萍、浏、醴会党各级首领和会众的极大愤慨。二是1906年春夏，湘、鄂、赣等省发生特大水灾，湘江沿岸各县付之一洗，“数百里间，汪洋一片，茫无涯际，死者三、四万、浮尸蔽江，被灾者三、四十万人，皆冻馁交侵，四乡乞食。此次奇灾，为湘省二百年所未有”^⑤。随之而来的是农村普遍歉收，粮价昂贵，一日数涨。而帝国主义各国利用湘江水路和株萍铁路之便加紧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吮吸着湘赣人民的膏血。官绅豪劣乘机横征暴敛，奸商囤积居奇，高抬市价。民不聊生，群情激愤。

刘道一、蔡绍南回国后见此情况，于是加紧活动，认真落实黄兴的指示，为萍浏醴起义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组织召开了四次重要会议。

第一次会议是长沙水陆洲会议。刘道一回国途次，便约集同志蒋翊武、龚春台、刘重、刘崧衡等在长沙水陆洲附近的一只船上秘密集会，“到三十八人”^⑥，会议根据黄兴的指示，把起义的策略方针，具体步骤和起义时间等重大问题，基本上确定下来了。会后，刘道一留驻长沙，掌握全盘，并负责与同盟

会东京总部联络，蔡绍南则回江西萍乡上栗市，负责发动萍、浏、醴会党。

第二次会议是萍乡蕉园会议。当时，萍浏醴一带会党，大致有三派：即哥老会、武教师会和洪福会（亦称洪福齐天党），各大派中又有许多小派。哥老会自马福益被杀后，以龚春台、李金奇、肖克昌、冯乃古为首，各有会众数千人，主要活动于萍乡安源、湖南醴陵和浏阳南部一带；武教师会以沈益古、廖淑保等为首，会众数百人，以萍乡上栗市一带为最多；洪福会以姜守旦为首，会众数千人，以浏阳为活动基地。蔡绍南回萍乡上栗市后，通过同盟会湖南分会负责人禹之谟的学生魏宗铨与会党联系。魏是蔡儿时的盟友，遂以魏家在上栗市开设的“全胜纸笔店”为掩护，很快结识了萍浏醴一带会党首领。为了将各派会党组织起来，在萍乡蕉园洞欧阳满家中秘密集会，以延请道士替亡故友人作冥寿为名举行开山大典，将哥老会和武教师会联合为“六龙山洪江会”，推举龚春台为大哥，以忠孝仁义堂为最高机关，总机关设在萍浏醴三县交界处的麻石。会后，各路码头官分赴各地，开堂散票，发展组织。

第三次会议是萍乡慧历寺会议。1906年7月，蔡绍南与龚春台、魏宗铨等人，又在萍乡县属大岭下弹子坑慧历寺召开会议，着重讨论密造武器火药、争取洪福会加入洪江会、并往日本谒中山先生报告经过请示举义日期等问题。会后，蔡绍南、魏宗铨前往上海，正拟东渡日本与同盟会总部联络，突然听到麻石发生事变。原来是年农历中秋，麻石开台酬神演戏，日聚万人，会党利用这一机会进行活动，不料三县官绅怀疑会党即将起义，立派巡防营袭击麻石。会党猝不及备，不战而散，第三路码头官李金奇遭清军追捕，被迫在醴陵白兔潭投河殉难。蔡绍南、魏宗铨在沪得报，便将联络任务另交李发群办理，偕宁调元立即赶回，召集各路首领，讨论对策，仍订农历年底清

吏封印时起义。兵分三路：“一据萍乡安源为根据地，一据浏阳、醴陵攻略长沙；一据万载、宜春东出瑞昌、南昌，进取江南”^⑦。此时，上栗市群情激愤，重阳节千余人在栗江书院为李金奇殉难召开追悼大会，因事失密，会目许学生被捕，解往萍乡县署杀害。接着慧历寺机关亦被查抄，形势急转直下，武装起义犹如箭在弦上，引满待发。

第四次会议是萍乡高家台会议。鉴于以上情况，是年12月3日，蔡绍南、龚春台、魏宗铨等人在萍乡上栗市以西的高家台，邀约各路码头官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对起义的时间问题发生争执。龚春台、魏宗铨等认为现时军械不足，与在长沙的刘道一又失去联系，主张“稍缓以待后援”^⑧，而原教师会首领廖日宝和众多码头官则认为现在会党人数众多，联合各地友党不下十余万人，主张趁官兵未到，即时起义，“尽可一决胜负，坚持不再拖宕”^⑨。双方相持不下，至天明，仍未获结果。大会经久不决，人数愈聚愈多，会众终宵扰攘，莫知所从。激进分子廖淑宝不愿再有任何迟疑和拖延、自率二、三千人跑到麻石，高举“大汉”白旗，率先发难。事已至此，蔡、龚、魏等人势成骑虎，迫于形势，只得立即宣布动员。以洪江会总机关名义檄知浏东洪福会首领姜守旦和普迹市哥老会大头目冯乃古，并饬知各县会党同时发动，就这样，酝酿已久的萍浏醴起义，比原定计划提前一个多月，于1906年12月4日全面爆发了。

经过和影响

起义爆发后，洪江会起义军定名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⑩，公推龚春台为都督，蔡绍南为左卫都统领兼文案司，魏宗铨为右卫都统领兼钱库都粮司，廖淑保为前营领带兼急先锋，沈益古为后营领带兼殿后指挥。起义军当即以“奉中

华民国政府命令”的名义，发布《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⑩，主张推翻专制政体，建立共和国，实现地权与民平均，深受群众欢迎，因而军威大振。起义当天，便大举向浏阳高家头、萍乡上栗市进攻，并一鼓而占领之。

麻石发难消息传出，各路会党纷纷响应。

浏阳南部洪江会众数千人，响应龚春台部起义。

浏阳东部和北部的洪福会众数千人，在首领姜守旦率领下，也立即响应起义，愿与洪江会实行军事上的合作，但不受节制。自称“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旗号“洪福齐天”，并发布《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布告天下檄文》^⑪，拟进逼浏阳县城，直逼长沙。

醴陵县参加起义的洪江会众除一部分农民外，还有众多陶瓷业工人和部分巡防营士兵。起义军分西、东、北三路，以西路为主，首领为李香阁，下分左右两军及水军，各有群众3千人，东路首领为瞿光文，北路首领为谭石基，各有群众数千人。

萍乡县安源，本是起义军计划中的根据地。有会众6千人，其中多为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工人。由于安源产业重要，又有德国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在此，向有清军守护。起义爆发后，官军增兵防范。12月7日，醴陵会党头目袁兰亭奉命去安源与肖克昌联络，不幸被捕，使安源与醴陵之间失却联系。随后，肖克昌被清军诱杀，群龙无首，致使安源工人未能发挥战斗作用。

除安源工人外，萍乡方面的洪江会还有不少农民和十几个官办、商办煤矿的工人以及上栗、桐木一带的手工业工人，踊跃参加。安源周围及宣风、芦溪等处煤矿工人也纷纷奔赴前线，“矿井辞工者每月以百数计”。

此外，宜春、万载两县也有一部分会党群众响应起义。

以上几个地区，先后投入起义战斗的共约3万人，从而使义军迅速控制了江西省的萍乡、宜春、万载和湖南省的浏阳、醴陵等5个县的广大农村地区，其先头部队，竟到达湘潭县境。

轰轰烈烈的起义，在国内和国外影响极大。国内一些报刊开辟新闻专栏，逐日报导所谓“萍乡乱耗”、“萍匪乱事”^⑬。外国报纸也纷纷报导起义消息，日本报纸还发行号外，逐日报导和评论。旅日同盟会会员闻讯，纷纷向总部请求回国参加战斗。孙中山先生回忆当时情形，曾写道：“丙午萍醴之役，则同盟会会员自动之师也。当萍浏醴革命军与清兵苦战之时，东京之会员，莫不激昂慷慨，怒发冲冠，亟思飞渡内地，身临前线，与虏拼命，每日到机关部请命投军者甚众，稍有缓却，则多痛哭流泪。”^⑭当时孙中山连日同会员商讨支持萍醴革命军的办法，派宁调元、谭人凤专往萍乡、醴陵联络，并派朱子龙、胡瑛、梁钟汉等回国组织起义，响应萍醴革命军。武昌日知会领袖刘静庵、张难先等得到萍醴革命军通报后，立即召集会议，密谋响应。在浙江，著名女革命家秋瑾也积极准备行动，以与萍浏醴革命军相呼应。

与此同时，清政府则惊恐万状。两江总督端方，江西巡抚吴熏熹向清廷奏道：“该匪初起，势甚猖獗，所到之处，胁民为匪，云集响应；未到之处，谣言四布，人心惶惶。”^⑮一时间，“官私各电，报告匪警者络绎不绝”^⑯。湘赣两省巡抚请求清廷增兵镇压，汉阳铁厂督办盛宣怀，安源煤矿总办林志熙等，迭向湘赣两省巡抚和湖广、两江总督呼救。清廷闻讯，立即调动湘、鄂、赣、苏4省军队5万余人，向萍浏醴地区包抄，实行血腥镇压。

帝国主义者认为“此次事变的严重性，远远超过一次地方性的骚乱”，“比无关紧要的骚乱要可怕得多”^⑰。因此，

英、美、俄、法、德5个帝国主义国家先后出动各类军舰20多艘，分别驶往岳州、汉口、宜昌、九江、上海等地，游弋长江和湘江，视察动静，张剑拔弩，准备随时向中国人民动刀。

面对敌人的优势兵力，起义者毫不畏缩，他们英勇奋战直到最后一个人。起义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2月4日到12日，这是起义军的进攻阶段。起义初期，当地虽有相当数量的清军，但敌不过人数众多，满腔愤怒的起义军；后来清廷虽陆续增调了大批军队，但到达有先后，刚到之时，阵脚未稳，难以发挥战斗力。因此，头几天中起义军到处进攻，所向披靡，多次大败官军。但是，起义军终究在装备和训练方面远不如官军。而且由于起事仓促，各股蜂起，号令不一，外界也一时接应不上。仅凭义愤和勇敢，自然难以持久。12月10日，驻守上栗市的义军五、六百人被敌军突袭围困，虽奋勇迎战，坚持半月，但伤亡重大。后军统带沈益古一手执锅盖，一手提大刀，力战群敌，连杀清军十余人，使敌军心惊胆战，但终以势孤力竭，壮烈牺牲。于是上栗市陷落。12日起义军同时在醴陵和浏阳两个战场上失利，死伤惨重，军事首领多人战死。从此起义军开始衰落。

第二个阶段，从12月13日到20日，是起义军和官军之间的相持阶段。

12月12日起义军在醴陵、浏阳失利后，队伍被打散，分割于萍、浏、醴各处。在清军处处设防，多方堵截的困难环境下，魏宗铨、廖淑宝等率领洪江会起义军各部，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灵活战术，与敌军周旋，顽强战斗四十余次，消灭清军不少，义军本身损失也很重。最后义军在上栗市遭到原与同盟会有联系的江苏新军统制徐绍桢背叛性的围杀，廖淑宝等首领及会众1000余人壮烈牺牲，仅魏宗铨带少数人逃出，不久也被杀害。姜守旦所部洪福会起义军，在浏阳境内也曾与清军作战多

次，12月20日，在平江县境内与清军大战，起义军败散，姜守旦率余部退入江西义宁（今修水）县境内。此后，起义只剩了余波。

第三个阶段，12月21日至1907年1月中旬，这是起义军战斗的尾声。战败的姜守旦余部退入江西义宁县（今修水县）后，到1907年1月14日被清军击败，全军覆没，姜守旦下落不明，至此，轰轰烈烈的萍浏醴起义最后失败。

这次起义，不同于旧式会党起义，明显地显示出同盟会的政治影响，以都督龚春台名义发布的檄文，强调除反清外，“必建立共和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而社会问题尤当研究新法，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至富者愈富，成不平等社会”^⑧。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国内却严重打击和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在国外也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反映了中国人民不可侮，中华民族不可欺的高尚气概。将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向前推进了一步，成为辛亥革命的一曲前奏。

二、九江独立

1906年萍浏醴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从1907年5月至1908年4月，在孙中山的直接领导下，同盟会在华南和沿海地区连续发动了六次武装起义。光复会还在浙江、安徽发动了两次起义，1910年2月同盟会又发动了广州起义，1911年4月27日（农历3月29日）发动了广州黄花岗起义，终于在1911年10月10日（农历8月19日）爆发了武昌起义，史称“辛亥革命”。13天后，九江宣布独立。

独立经过

九江之所以在江西首先响应武昌起义，这是与其地理位置

分不开的。九江居长江中区，上接武汉，下通沪宁，信息灵通，风气早开。同盟会人在九江暗设机关，冀图联络各方党人，乘机大举。先是闽人林森在九江任海关文牒，粤人吴铁城家居九江（铁城之父在九江和牯岭均设有和昌办馆），他们与罗大佺、陈中瑞、徐秀钩、蔡公时、吴照轩，俞醒更、张世膺、沈元龄等经常聚会，进行革命活动。并组织一书报社于九江之八角坊为秘密机关，与外省相联络，输入书报，鼓吹革命。

接着，部分革命党人有鉴于萍浏醴等历次起义失败的教训，认为“会党发动易，成功难，即成而器悍难制，不成则徒滋骚扰”^⑨。于是，他们把工作重点逐渐转移到发动新军方面。九江方面也是如此。当时，驻九江的新军，有南京派来的第五十三标（标统马毓宝）和南昌派来的第五十五标两个营。1911年农历七月间，有赵声部下之杨同志来九江运动起义，与驻九江的新军第五十三标排长何燮桂、顾英、黄锦龙、丁仁杰、胡爱德以及炮台炮目陈廷训等取得联系，并进行密议，拟于农历八月十五日夜与南昌之工程队会同武昌方面同时发难。后接南昌韦兆熊密函，略谓清吏防范甚严，宜多派同志联络，再壮大力量！始可达目的。于是，以五十三标第一营队官刘世钧，第二营排长顾英，第三营排长何燮桂各负责联络其本营同志。不久，传来武昌机关破获消息，乃不敢轻动，决候南昌及武昌有发难消息再动。

此时，江西武备学堂出身，留学日本时曾参加同盟会的江西籍人李烈钧，因在五十三标中有许多同学和同事，他利用这种关系，也进行联络策反。（九江光复时李烈钧不在九江，光复后两日才抵九江。）

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日）武昌孙武（尧卿）等高揭义旗，举黎元洪为都督，风声所播，全国欢腾。九江方面，林森、吴铁城、罗大佺、陈中瑞、吴照轩、许森、徐起兰、

蔡辰白、魏毓生、何瑞昌、何震生等人即酝酿响应，积极同新军联络。10月22日（农历九月初一），突闻湖南已响应武昌起义，宣告独立。于是，有新军五十三标教练官黄子卿各方奔走，并商得标统马毓宝赞同，联合五十五标一营管带范绍先、二营管带何振达及炮台守将徐世法等共同举事。10月23日晨六时，九江城内居民纷纷迁避，有人询问原因，便说今夜新军将起事。当晚八时许，岳师门外金鸡坡炮台由炮目陈廷训发炮三响，接着又响一排枪声。城内道署卫兵听到炮声，知是起义讯号，即在头门举火内应，新军各营立即吹号集合，各军士都手缠白布，上印同心协力四字，荷枪实弹，分据各隘道，沿途枪声不绝，先攻道署。九江道恒保逃入租界，搭隆和轮遁上海。接着分队进攻各衙署。有军士想纵火焚烧道府两署，马毓宝立即命令制止，并派卫兵看守。又在道库搜获白银10余万两，查点数目后，也派人守护。夜十二时许，进攻府署，九江知府璞良率领仆从荷棍棒守衙署，革命军一举攻入，捕获璞良。璞求死，说：“汝等排满，我满人也，万无生理。且我食君之禄，汝等即不排满，我亦当与城偕亡，断不偷生苟活”。^②革命军管带张某见璞忠义，开始以礼相待，劝其归顺，璞抵死不从，遂杀之。凌晨一时攻提法使行辕，因行辕在铁路公司，后户即南门湖，提法使张检由后户乘舟逃走。其卫队40人归顺革军。当革命军来到电讯局，局员都赞成革命，仍照常供职，但不许替满清官员发电。无既明，军士沿街巡逻，劝商人照常开市，合城安堵。

10月24日（农历九月初三）早八时，城内外贴出文告，文意与武昌起义文告略同，并有黎都督字样，又于城内延支山高竖马字（马毓宝）、徐字（徐世法）、陈字白旗各一面，这时，城内外警察也同时响应，左手各缠白布。只有前由省派来的五十五标第二营（驻火柴厂）统带庄守忠不肯赞成革命而潜

逃，新军追之不获。城外秩序较为混乱，大码头协顺土店，在骚扰中被匪抢去铜元数十千、银元若干，由革命军捕获3人，就地正法，并追回该店之损失。又当起事时，革军曾通知各教堂教士及租界外人，一律保护，切勿惊慌，所以外人都未离境。至于九江原有的常备军，本无举动，自从南昌派提法使张俭到九江督办江防，继而周树森监督炮台，限制出入，军心乃变，都说“当官的既不相信我们，我们如何出力^②”。适有湖北省军政府派员来游说，乃秘密集议与五十三标采取同一行动。

革军占领九江后，即于招商局码头竖立中华民国大旗，军、学各界以及城中商店均悬挂白旗及欢祝民国之小旗。此次起事，据陈春生撰《辛亥江西光复记》说：“多由林子超擘画布署，又先得（海关）关员西人赞成，故着手颇易。初林被举为九江道，马毓宝为驻浔统领，徐世法为驻浔炮台统领，李云峰为驻浔副统领”^②。数千年之专制政体，在九江便宣告推翻了。

独立之后

九江独立之后，南昌、安庆尚未光复，内部组织也不健全，而马毓宝革命意志亦不甚坚决，于是有吴照轩、蒋群等强将马之辫发剪去，以绝其模棱两可之心事。并着手组织机构，将原来的九江道署改为军政分府。众举马毓宝为中华民国驻浔军政分府都督。分军务、政务二部，军务部由马自兼；政务部由罗大烥任部长，林森任副部长。另举张鲁藩为运输部长。李烈钧于光复后两日赶到，公举为参谋部长，蒋雨岩为副部长，又举吴照轩为政治参议，蒋群为军事参议，宛西庚任九江县长，陈中瑞（霭亭）则襟怀淡泊，功成不居，在商界竭力赞助。

在军事方面，起事之前，五十三标即已密告驻瑞昌之第三

营迅速开拔返浔，驻浔之一、二两营即向省方派来之部队进击，不久即击溃。排长何燮桂乘胜率兵占领九江上游之田家镇炮台，扼守长江隘口，于是长江交通断绝，汉口清舰接济中断。十月二十四日（农历九月初三），清军守湖口的总镇杨福田调集炮艇，将与革军对抗，被革命军击败，清兵举白旗投城。革命军乘胜占领湖口炮台和马当炮台，进一步控制了长江交通。

武昌起义后，清廷命海军提督萨镇冰调集军舰游弋于长江水面，为武汉清军之应援，并率舰多艘往武汉镇压革命。自闻九江独立，金鸡坡炮台被革命军占领，惟恐燃料、粮食等无法接济，慌忙下驶，拟赴上海。当时带队的是海军司令黄钟瑛，统率有海筹、海容、海琛三艘巡洋舰；楚同、楚有、楚谦、楚豫、江元、江亨、江利、江贞八艘炮舰及湖鹏、湖鹗两艘鱼雷艇。当驶近九江时，金鸡坡炮台司令见兵舰停泊不定，恐其有异，连发炮击之。兵舰遂用旗语表示合作。马毓宝、李烈钧闻报，即令停止攻击。鉴于海军舰长，官兵多属福建人，乃商林森以同乡关系赴舰联系，并派参谋龚少甫（亦福建人）卓仁机等同往。说以民族大义，劝其合作，并负责筹发薪饷，各舰将士同意加入革命军。于是在商会设宴欢迎。这时，马毓宝密使炮台司令戈克安将兵舰炮台拆下。正欢宴时，黄钟瑛闻讯变色，立即令其同人回船准备作战。当时李烈钧认为革命军战斗力不能与抗，采取和平解决，幸当时林森及龚少甫、魏子洛等人在座，即请舰方将领以福建同乡关系登台演讲，缓和空气，海军怒气稍平。复入座时，戈克安亦盛气而来，李烈钧即笑慰之，并双方介绍，杯酒联欢。次日，李烈钧派人将炮台台送还舰艇，事遂解决。事后，革命军要求每艘大舰拨出马克沁机关枪两挺，小舰拨出1挺，没有机关枪的拨出6至10支步枪，带同士兵配件登陆，以充实陆上军力，各舰艇都同意照办。这样，

清廷全部海军便在九江起义参加革命，并通电全国要求清朝皇帝退位。马毓宝认为海军既已联合，便任李烈钧为海陆军总司令。

10月29日（农历九月初八）清海军提督萨镇冰由九江改姓名登大通轮船逃往上海。同日，海筹、海容、海琛、江贞等舰及鱼雷艇湖鹗由九江上驶。下午三时，海容进至武昌黄鹤楼下傍一小轮而泊，将所载机关枪运入武昌，接济革命军。鱼雷艇湖鹗继续前进，遭到江岸清军发炮攻击。未几，海容驶近，急发炮猛击江岸清军炮兵阵地，只见尘沙飞扬，炮兵均殒。海容下驶至七里沟附近尚发炮不休，清军汉口以东之阵地几全被摇动。以后清军攻陷汉阳，挟龟山巨炮隔江攻击武昌，然革命军有舰队为助，因而能据城固守，使清军终不得逞。又由于长江海军已全属革命军，使袁世凯无力以图江南，只有停战议和。

此外，九江独立，影响了下游的安徽。先是安徽满清巡抚朱家宝见形势不佳，伪称独立，将巡抚部院改为都督府。九江李烈钧据安徽留日同学胡万泰反映，知朱有诈，命黄焕章率步兵一团开赴安庆，包围抚署，放枪示威，逼走了朱家宝，不意黄部到皖后纪律废弛，兵士剽掠，箱笼山积，皖人来电九江告状。李烈钧决定亲往镇压，并率海筹、海容两兵舰及步兵一营随之。到皖后，皖人举李烈钧为安徽都督。李以出自民意，遂就任。当将团长黄焕章看管，并将肇祸人顾英枪决之，复令黄部士兵将所掠财物悉数交出，搬入都督府，邀请商会派人会同发还原主认领。秩序井然，一时颂声载道。但皖人派别甚多，地域之见，非常严重，使李烈钧工作感到困难。此时，正值清廷所派之南下军队进逼武汉一带，战争剧烈。李烈钧应湖北黎元洪电请率师援鄂。及师抵湖北孝感，而议和已成，李烈钧被孙中山任命为江西都督，遂返江西。

综观九江之响应武昌起义，宣布独立，占领炮台，联合海

军，有助于解除清军对武汉的威胁，对皖、苏两省之迅速光复，特别是对江西省会南昌之迅速光复，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整个辛亥革命至关重要的一环。

三、南昌光复

兵不血刃

九江独立后，全省人心震动，南昌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同盟会员的活动也更加积极。

早在1906年，孙中山便派黄格鸥、魏会英等回江西建立同盟会支部，黄格鸥被任为同盟会江西支部长。他是清江人，回到南昌，便在赐福巷成立了江西支部，展开了工作，积极办理会员登记和入会申请等手续。当时江西人民因受“维新失败”和“南昌教案”等事件的影响，很多人同情革命，因此参加同盟会的人很多，组织发展很快。1906年，江西编练新军，同盟会派了不少会员投入新军，象同盟会员李烈钧、欧阳武、胡谦、方先亮等，先后任新军各营管带，官兵中都有不少富于革命思想的优秀青年。辛亥革命前夕，江西的新军几乎全操在革命党人手中。再加上夏之麒领导的江西陆军小学、俞应麓领导的测绘学堂和彭程万领导的测量司学员，共有四、五百人，富有革命意志，受过军事训练，并发有枪支子弹，他们和新军结合在一起，已在酝酿响应革命。

武昌起义后，武昌同盟会的领导人孙武派丁笏堂（立中）携带文件回南昌，策动党人鼓动新军起义，声援武汉。丁回南昌后，即与党人秘密联系，进行策划。

其时，江西巡抚冯汝骥于武昌起义后亦召集僚属会商对

策。即调步兵五十五标赴九江增援，特令臬台张俭赴九江督师，调上饶防营统领刘懋政迅率所部兼程限期赶到南昌加强城防，监视城外新军和城内学生，还软禁新军混成协协统吴介璋于巡抚衙门内。对新军和陆军小学学生则进行“安抚”，集合一起讲话，说什么藩库现存库银200余万两，粮盐仓储丰富，可以支持三年两载没有问题，并宣称从农历九月起，在省官兵一律发双薪，企图收买人心。又将过去用来镇压太平军的联珠炮摆在巡抚衙门大堂两旁，恐吓老百姓。并招募外地籍新兵100名用来扩充卫队。可是就在巡抚衙门扩充的卫队中，同盟会即暗派童玉山、王有才、薛洪保等混了进去，他们在举事前即先夺取了联珠炮炮闩及军装库的锁匙。冯汝骥的欺骗、收买的怀柔政策完全破产。

10月25日（农历九月初四），九江起义的捷报在南昌传开，《江西民报》大造革命舆论，发表社论并刊登九江、武汉方面的革命文件和布告。突然之间，风云变色，全城人士哗然若崩。清朝的江西参议官张季煜、陆军协统吴介璋，已有与革命军联合之动机。

10月28日（农历九月初七）同盟会南昌支部于新军工兵队召开秘密会议，到会20余人，决定10月30日晚上起义。

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江西民报》发行红报，发表题为《满城风雨近重阳》的社论，文章开头一句便是“满清政府从此长辞矣！”是夜，南昌新军按预定计划起事。骑兵营排长蔡森率领爬城队于晚上十一时三十分，从顺化门外爬墙进城，首先发难，打响第一枪。炮营熊天觉，马营方先亮、李伯年等也同时响应。抚院的卫队和警察，因事先有联络，即从内部响应，用煤油烧燃抚院两侧的鼓楼、旗杆等，火光烛天。同时打开城门，接应起义新军入城。于是新军的骑兵营、工兵营、辎重队蜂拥进城，分头占领各重要据点。10月31日凌晨，

巡抚冯汝骥已知新军起事，吓得心惊胆颤，从床上爬起来便召集各司道到抚院开会，他想派卫兵去通知，而卫兵已参加起义，他即令劝业道傅春官召集各界开会，而冯汝骥自己却从后门逃走，避匿于旺子巷（今后强路）民房内。至此，大小官吏相继逃避一空。城内五十五标新军、宪兵和武装警察队仅在营房内戒备，都未反抗。江西省会南昌，就这样兵不血刃地光复了。破晓之后，参加起义的新军各部和各学校负责人在陆军小学开会，商讨善后事宜。决定由陆军小学和测绘学堂的学生维持治安。守城的各部，一律悬挂白旗，手缠白布，作为起义的标志。

四易都督

南昌光复的当天晚上，各界在商会集会，决议拟请巡抚冯汝骥参加革命，并选举其为江西都督。于是转到江西咨议局集会，并邀请冯汝骥到会，说明“如冯巡抚赞成革命，由各界推任都督，不但治安无忧，且可匕鬯不惊”。但冯汝骥思想顽固，说他“以末秩受清朝厚恩，蒙任封疆重寄。既不欲违背潮流以糜烂地方，尤不能受各界推载，为国之叛臣。即请咨议局代表人民公意，另推都督，以维持治安”。并表示“我可以完全避让，即日离城赴浔北上”。^⑧于是匆匆返院收拾行装，出章江门登某小轮开赴九江。（至九江后，被彭学道、卓仁机等发现，挟其上岸，住花园招待所，不数日，吞鸦片烟膏自尽。）

11月1日（农历九月十一），同盟会召集各界负责人在合同巷万寿宫商会举行会议，决定：（1）通电全国，宣布江西独立；（2）通过以新军第二十七混成旅协统吴介璋为江西都督；（3）公举刘风起为民政部长，熊天觉为参谋长。又推雷恒为财政部长，李瑞清为文事部长（由副部长熊育锡代理）。当天，吴介璋正式宣布就都督职。并派吴宗慈为都督府秘书长，夏之麒

为参谋厅厅长，朱寿同为军务厅厅长，王禄之为总务厅厅长等。于是清朝在江西的统治，遂完全被推翻。暂以铁血十八星旗代替国旗。并发布檄文，昭告全省。暂改行黄帝纪年（辛亥年为黄帝纪元4609年）。规定以青蓝布衣为礼服，废除作揖、跪拜的封建礼节，剪掉男子拖在身背的长辫。同时，按照新军组织，着手整顿和改编军队。根据党人计划，下令查抄部分最反动的贪官污吏如石守谦等的财物。但对于社会经济制度，却没有什么变革，而且扩军购械，还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尤其是吴介璋没有应付好当时复杂的人际关系，如吴在光复前曾被软禁，与军事参议官张季煜意见很深，后张赞成革命，光复后关系难处；同时吴又与五十五标新任标统冯嗣鸿及从上饶调来的防营统领刘懋政尔虞我诈；混成协骑兵营排长邹恩灏也参加了反吴的行列，因此吴介璋在工作上提襟见肘。

11月12日（九月二十二日），江西军政府忽接一信，内称孙文、黄兴已在海外开会，公举广信府贵溪县留日毕业生彭程万（当时充江西测量司司长）摄理赣军都督等语。又传诚恐军民不肯承认，已派敢死队100人进城，预备施放炸弹。以致旧藩署内军民两部颇形恐慌。旋即在军政府召开会议，新军五十五标营兵上子荷枪排列四围。会上邹恩灏报告：“我在武昌时曾谒见黄克强先生，谈到江西光复后人选问题。我提出彭程万为适当人选，黄克强先生说此事已在海外开会同意，并发给了印信，托我带回江西”。^②（后查明印信系邹恩灏伪造，旋邹在九江被马毓宝枪毙）。到会各人均无异议。彭程万表示“吴都督既已离职，暂时出来维持局面”。并于11月13日（九月二十三日）发布就职告示。吴介璋任江西都督仅13日。

彭程万接任江西都督后，局面仍然混乱，据欧阳武的回忆录说：“我找到彭都督的办公室，看见好多军官包围彭都督，要他写条子，这个要钱，那个要官，闹得不可开交……当时江